

试论梭罗与爱默生人性观的异同

韩德星

摘要：超验主义的人性观对美国清教主义的性恶论形成极大的冲击，为美国式个人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爱默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晚辈的梭罗吸收了爱默生的人性观，但又在善恶二元论上持有不同的见解，如果追根溯源，将不难发现二人与基督教传统神学之间的不同归属关系。

关键词：梭罗；爱默生；超验主义；善恶同体论

作者简介：韩德星，男，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71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3-0100-05

在美国文化发展史上，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超验主义运动对建国后美国文化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今天看来，超验主义的最大功绩就是对殖民时期的清教主义传统进行了清算，并进而催生了乐观自信、以追求独立自由和个体价值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核心理念。超验主义对清教主义的清算是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对其人性论的颠覆更是重中之重。钱宁、爱默生、布朗森等人人都对此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尤其是爱默生对性善论与人格完善论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这些超验主义者中间，梭罗却保持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立场，他较爱默生而言，更加突出恶的实存性，并将恶的内在化存在视作促进人格完善的一种必备物，这种人性论从另一个层面丰富了美国超验主义的伦理观念。本文试图结合超验主义时代的思想背景，以善恶论为中心，比较分析梭罗与爱默生人性观的异同，并探讨二者与传统基督教神学人性论之间的归属关系。

一、超验主义运动兴起时的人性论

美国清教主义的根基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教被认为是“东方专制主义与16世纪君主政体的一种混合”，^[1]尽管加尔文教徒深刻的自我意识和罪感意识为个人主义的形成预备了心理基础，但它的“性恶论”与“预定论”却严重制约着个体对自我的评定和认识，限制了人性的健康发展。到了19世纪30年代，加尔文清教主义的性恶论受到了浪漫主义人性观的冲击。此时的美国需要的不再是殖民时期旧美国视人性为邪恶的悲观主义，而是要彻底颠覆传统的充满活力的乐观主义。美国学者艾威特·卡特（Everett Carter）借用爱默生的话把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概括为“美国信念”（The American Idea），^[2]这种信念由杰斐逊和富兰克林开创，由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人以新的形式加以巩固，但同时也在爱伦·坡、霍桑、麦尔维尔等人那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这种信念的根本内涵就是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对人之性本善的信赖，而后一种观念又是前一种观念形成的基础。卡特提到最能代表这种信念的词是“原始主义”（primitivism）和“美国的亚当”（American Adam）这一短语，所谓“原始主义”，在此“不再是一种历史姿态而是一种道德立场”，它和“美国的亚当”一样被人们用来指称人的原初的纯洁性。^{[2]（8-9）}

具体地看，在19世纪初的波士顿（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心康科德镇位于波士顿西北部约20英里），卢梭“人本质上完美”的信条借助于唯一神教的掩护已经开始四处弥漫。唯一神教的核心人物威廉·

埃勒里·钱宁对超验主义者影响极为深远，甚至有学者直接将他归入超验主义团体中。^① 在其《唯一神论的基督教》一文中，钱宁批驳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贬低和压制，认为“所有美德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道德本性即人的良知、责任感以及按照良知来培养性情组织生活的能力中，我们相信这些精神上的功能是形成责任心的基础，也是人类天性的最高特征，没有任何行动有比源出于这些功能的行为更值得赞赏。”^[3] 在另一篇文章中，钱宁写道：“因为人都有道德力量，每个人的心中都拥有可以约束自己的法则，因此我无法忍受一个人被其他人基于贪婪和傲慢而变成他们的工具。因为我看见了他伟大的本质、内心神圣的偶像、巨大的潜能，所以我请求给予他自我发展的途径、自由的空间——我呼吁社会不要限制，而要帮助人类成长。”^②

除了以钱宁为首的唯一神教以外，与超验主义几乎同时出现的完善论运动也在宣传人性善观念，其领导人物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1834年创办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完善论者》（Perfectionist）月刊，再加上完善论者和自由论者的各种集会，从而使得19世纪40年代的新英格兰成为“完善论风起云涌的年代”。^{[1](644)} 随后的爱默生更是推波助澜，在其著名的《对神学院毕业班的讲演》（1838年）中，爱默生认为“上帝对灵魂的恩赐并非是巨大的、难以抗拒、独一无二的神圣，而是甜蜜而自然的善良，正如你我的善良。”^[4] 他认为人的心智具有向往美德的本性，“道德感的直觉是对灵魂法规完善的洞察”，所以美德就是内在于人自身之中的力量，它可以“迅速地到处发挥作用，纠正谬误，消除误兆”，使“背弃自己的人最终回归自己”，由此“人成为它自己的上帝”。^{[4](88)} 在《论自助》中，爱默生指出：“归根结底，除了你自己心灵的完善外，没有什么神圣之物。”^[5] 如果说钱宁只是在有限的理性范围内将人的本性提高到了犯罪前的亚当的层次，突出人之初的纯洁性，那么，爱默生则不但承认了人的原初的纯洁与善，而且将人推向了神的高度。

二、爱默生、梭罗基于善恶二元论的不同人性观与人格完善论

爱默生的人性观正是源于他的“超灵论”。在他这里，神或上帝不是别的，就是包罗万象的整体灵魂、精神或“超灵”，“精神就是造物主，它有自己的生命。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里，人们都用‘上帝’这个词来代表它”，^[6] 而人就是精神或超灵的化身，人身上“有着整体的灵魂”，“在灵魂的每一个行为中都有人和上帝的统一”，^[7] 所以人的天性即精神与灵魂的本性必然是纯洁的，而且是神圣的，人不需依赖或求助于任何外物、外人或权威，只需“倾听他自己的声音”，就可以获得智慧，引领自己成就崇高的自我。爱默生的这种理念也构成了他的“自助说”（self-reliance）的基本精神，而“自助说”作为一种建立于唯心论之上的自我完善论，成为超验主义运动的核心理念。^③

爱默生的完善论中同时也包含着对于恶的认识，他说：“每甜必有其酸，每恶必有其善”，“同样的二重性构成了人的天性和状况的基础”，“每一件事都有两面：一面善，一面恶”，^[8] 所以，善与恶总是共存的，相互补偿，此消彼长，从而维持一种整体的平衡。不过，在爱默生这里，恶不是别的，而是善的缺乏，“善良是绝对的，而邪恶是短缺而致，不是绝对的。”^{[4](88)} 因此，爱默生的这种善恶二元论与他的自助说并不冲突，正像卡特指出的，爱默生是将这种相互对立、补偿的二元“纳入到整体的善这一统一体中的”，^{[2](82)} 即相对的善、恶终归将被一种绝对的更高的善所统一，用爱默生自己的话说就

① 有些著作就将钱宁的文章编排在超验主义的目录之下，如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hilosophy: A Book of Reading*, edited by Walter George Muelder, etc.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0.

② 转引自沃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4页。

③ 爱默生的“自助说”还成功地吸收了来自歌德、威廉·洪堡等人的“自修”（self-culture）观念，小罗伯特·理查森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可参见 Robert D. Richardson Jr. *Henry Thoreau: A Life of the Mi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54-56.

是：“存在就是巨大的肯定，排除了否定，有自我平衡，把所有的关系、部分和时势统统吞下肚去。自然、真理、德性就是从那里涌进来的。恶就是没有、或离开同一种事物。”^{[8](332)}在爱默生这里，人性多就是善，人性少就是恶，^①人性的二重性很大程度上是由经验世界的负累造成的，在更高的超验的层面上并不存在二重性，即人作为“超灵”存在时没有二元只有一元，因此，人们只要回归于灵魂自身（即纯然的天性），是可以远离所谓的恶的，恶属于现实的人性，而超验的人性则是绝对的善，相对的恶尽管存在，但它终将归附于或趋向于绝对的善，由此，爱默生得以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贯彻到底，“他发现事物都是为真与善安排的，茫茫世界，没有恶棍的藏身之所”，^{[8](329)}“腐尸在阳光下就会转变成花草；人虽然在妓院里，在监狱里，或在绞架上，但正向善与真迈进。”^[9]

爱默生用超验的善统一了带有经验判断意味的善与恶，但是在梭罗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统一，而是斗争。人具有神性和善恶的二元性，在这一点上，梭罗与爱默生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梭罗的作品中，善、恶都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超验的本性，皆是实存的，我们很难看到二者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级的善的统一体。梭罗在其道德政治学中提倡的“绝对的善”并不同于爱默生所说的超验统一体，而是人性善的抽象性，所以，在爱默生那里，“善人具有绝对的善”，^{[8](329)}但在梭罗这里，“每个人身上都有个魔鬼，最终那魔鬼能犯下任何罪性”，^[10]善人也有恶，他只具有相对的善。如在1841年的一篇日记中，梭罗生动地描述了作为一种恒久常态的善恶二元并存：“在我们最神圣的时刻，我们的恶魔闪着秋波就站在旁边。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家伙。我不得不承认，它赢得了恶习的尊敬，因此让我们记得它是多么的不屈不挠。它至少有勤奋这一优点。当我怀着热忱去干美好的事情时，我的恶魔肯定卷起他的长袍，像我一样立刻到达那里，他诚挚热情的表现使得我最良好的意图也不免羞愧。”（1841年2月8日）^[11]恶魔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显示了恶在人性中的根深蒂固，但是，梭罗看到，恰恰是因为在每个个体中恶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才使得善的存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我们的罪过，我们什么也干不好。罪过是我们美德的公用通道。”（1842年3月22日）^[11]“我们都是双刃剑，在每一次激励我们的美德时，作为回应，也在鞭挞着我们的邪恶。”（1841年2月8日）^{[11](32)}梭罗发现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他的二重性，人格的形成就在于用人性中的善去对抗人性中的恶，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人只有在矛盾中才会获得自己所追求的，这是一切人性中的不完善性”，^[12]矛盾即来自于人的双面性，人正是通过进入双面性来获得对自我的超越性的，通过不完善性而渐次接近完善性，因而善恶对抗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对抗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纯属个体自身的事情，因此，进一步说，人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善恶的自体，而且在于选择的自由（康德深谙此理，遂将绝对自由作为道德的前提），可以用自己的一方战胜自己的另一方，“一个人的生活中的独特之处不仅包含着对本能（instincts，或天性）的顺从，也包含着对本能的反抗。在一个方向上或另一个方向上，他努力去过一种超自然的生活。”^{[11](53)}非此即彼，于是，人成为自我选择的产物。

由此来看，在爱默生那里，人的完善即是对绝对的善的归附，是绝对的善在人的精神中的充盈状态，恶是对绝对的善的偏离，是人对自身精神与灵魂的无知，复归本性的纯洁就是人格的完善之途。在梭罗这里，复归本性则意味着复归自身的双重性，人格完善不是对自身之善的归附，而是灵魂在善恶内在冲突中的自我历练以及由此不断获得的自我升华。

三、爱默生、梭罗与传统基督教人性论的不同归属关系

如果从传统的基督教人性论角度上说，爱默生的理论应该属于奥古斯丁传统，不过是他抛弃其

① 如爱默生说“真正的人，仁慈的人，智慧的人比起傻瓜和恶棍来，是一个人性较多的人，而不是人性较少的人。”见《论补偿》，《爱默生集》（上），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蒲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33页。

“原罪说”和“预定说”而超越了这一传统，而梭罗的理论属于少数派的希腊早期教父爱任纽^①传统，同时，梭罗亦抛弃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接近当代的生态创造论神学。奥古斯丁传统认为人被上帝一次性地造好了，因此是一个原初完美的存在者，人原本可以达到上帝所期望的神性高度，但是过早地堕落了，这种堕落是由于神性或绝对善的不在场，是世俗人性的缺陷，如奥古斯丁在《论善的本质》中说：“邪恶不过是，本性或在程度上、或在形式、或在秩序上受到败坏。因此受到败坏的本性，叫做邪恶，因为毫无疑问的，本性只要没有受到败坏，就是良善的，但只要受到败坏，它就是邪恶的。”^②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邪恶并非人的一个本性或本质，而是神原本所创造的良善受到败坏的结果。同样，在爱默生看来，人的本性中是绝对的善，只要回归本性就可以超越堕落而达到完美，恶是相对的，是善的缺乏，善是绝对的统治者。

爱任纽传统则认为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作为一个位格的和道德的存在者已经是上帝的形象了，但是还有待成为上帝的确定的样式，第一次受造后的人只是一种原材料，还有待进一步的完成，但二次创造并不由上帝来做，而是“上帝引导着作为相对自由和自律的位格的人，通过他们自己在世界中（是上帝将他们置于其中）对生活的应对，来获得位格存在的那种品质，即成为确定的上帝样式”，^[13]在从形象到样式的转变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克服先天的不完善性（即恶），从动物生命的存在水平向更高的永恒生命的水平转化，当然，后者包含前者又超越前者。于是，个人通过长期的道德努力而趋于完善性，善成为目的，恶与自由意志则成为塑造灵魂的条件，因此，在爱任纽这里，救恩就是人类的更新变化，成为分享神性的人，人类通过对自己的“圣化”（同时仍然是人）来扭转因亚当而进入人性的罪、败坏和死亡，而获得不朽的生命。^[14]这正如梭罗说的：“那个确信他身上的兽性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不断成长起来的人是有福的。”^[15]由不完善而趋于完善是梭罗的完善论，也反映了他在自知自明基础上自觉的人格追求，而爱默生的完善论是指人由现在的不完善回归原初的完善，所以，从人的形象和性质而论，在爱默生那里，人就是神，但是在梭罗这里，人只是有待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的半神半人，他说：“我担心我们只是这样的神或半神半人，就像半人半羊的农牧神和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也就是神性与兽性为伍，是贪求满足欲望的动物。”^[15]

于是，在梭罗看来，善恶二性并存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成为一场持久的战争，“在善与恶之间从未有过片刻的休战”。如果说善是人的一种从属于神性的高级本性的话，那么恶就是人的从属于动物性的低级本性，对于后者，梭罗认为“我们也许有可能避开它，但无法改变它的本性”，^{[15] (563)}显然也更不可能消灭它，因此，同体共存的善恶矛盾成为最本真的人性冲突，它提升着人性和人格。在梭罗的思想中，“战争”也就成为人生完善论意义上的一个隐喻。

总而言之，在人性观上，虽然爱默生与梭罗都持善恶二元论，但是对善恶本体的认识却有很大的不同，爱默生更多地延续和发展了卢梭与钱宁的性善论，在实体上以超验的善取代了恶的实存性，从而完全摒除了清教主义的性恶论。而梭罗这个从来不去教堂，并以潘神崇拜者自居的自然主义者在骨子里却多少保留了清教主义的遗风，他相信恶的实存，并把这种实存与人的肉身结合起来。他并不像爱默生那样从超灵的意义完全否定恶，而是在人格自身建构的过程中充分肯定恶的实存的价值，这种思想无疑丰富了超验主义的人性观，并在取向上与后来的尼采有着共鸣之处。

① 爱任纽（Irenaeus，又译伊里奈乌，约130-约202），希腊早期教父，公元178年左右任里昂主教，著有《反异端论》五卷。

② 转引自[美]奥尔森（Roger E. Olson）《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77页。

参考文献：

- [1] [美] 沃浓·帕灵顿. 美国思想史 [M]. 陈永国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351.
- [2] Everett Carter. *The American Idea: The Literary Response to American Optimism* [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7: 7.
- [3] William Ellery Channing. “Unitarian Christianity” [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hilosophy: A Book of Reading* [C]. Walter George Muelder, etc.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0: 126.
- [4] [美] 爱默生. 对神学院毕业班的讲演 [A]. [美]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上）[C]. 赵一凡，蒲隆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93-94.
- [5] [美] 爱默生. 论自助 [A]. [美]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上）[C]. 赵一凡，蒲隆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286.
- [6] [美] 爱默生. 论自然 [A]. [美]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上）[C]. 赵一凡，蒲隆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22.
- [7] [美] 爱默生. 论超灵 [A]. [美]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上）[C]. 赵一凡，蒲隆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425, 438.
- [8] [美] 爱默生. 论补偿 [A]. [美]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上）[C]. 赵一凡，蒲隆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318, 331.
- [9] [美] 爱默生. 神秘主义者斯维登堡 [A]. [美] 吉欧·波尔泰. 爱默生集（上）[C]. 赵一凡，蒲隆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755.
- [10] [美] 梭罗. 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 [A]. [美] 罗伯特·塞尔. 梭罗集（上）[C]. 陈凯，许崇信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6：255.
- [11] Odell Shepard. *The Heart of Thoreau's Journals* [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7: 31.
- [12] [丹麦] 克尔凯郭尔. 基督徒的激情 [M]. 鲁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56.
- [13] [英] 约翰·希克. 恶与灵魂塑造 [A]. [美] 迈尔威利·斯图沃德. 当代西方宗教哲学 [C]. 周伟驰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56.
- [14] [美] 奥尔森（Roger E. Olson）.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M]. 吴瑞诚，徐成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7.
- [15] [美] 梭罗. 瓦尔登湖. [A]. [美] 罗伯特·塞尔. 梭罗集（上）[C]. 陈凯，许崇信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6：564.